

第五章 目 的 不 明

洗掉背上的大字

1月6日，段克文也调来了。9日，让我、黄炳寰、李树桂、刘荣第、段克文5个人把东西准备好。别的人在屋看文件，我们把东西包好，行李打好，在楼下坐着。解管教员来了，我说到厕所大便去，他准许我去了。段克文也报告上厕所跟我来了。

在厕所里，段克文问我：“咱们这是到哪去呀？我直嘀咕。”

“跟我在一块没有坏地方，第一是北京，第二是市局，放心吧，擎好吧！”

这些话被站在厕所门口的解管教员听到了，我们出了厕所，解管教员问我说了什么？我如实说了，解管教员笑了。

9点钟，把我们提出去。门口停着一辆装货的大卡车，上车后两个人一副铐。出了监狱大门，汽车向西驶去。住了将近三年的监狱，这回告别了。我没有一点留恋，没有一点不高兴。在这三年的时间里，我得到的教育没有受的痛苦多，这就是长春监狱给我的印象。我清楚这些问题不属于政策方面，而是属于执行政策的人。这

一点，我没有把它们混淆起来，我有最起码的判断是非的水平。

汽车不是开往市局，也不是开往车站，我心中随着汽车轮子的转动猜疑不定……汽车开到一座建筑物的后面，我们把东西搬进这个建筑物，又搬上楼。我的东西多，浑身没有气力。我们背后都写着“犯人”两个白字，在楼上一站，许多人像看新奇动物那样地注视着我们。解管教员进了一个屋子，不一会儿刘科长出来，站在楼梯口上，简单地对我们说：“现在把你们集中到这儿，进行加速改造。这儿的各方面都要比过去好，饮食上还可以吃到比较有营养的东西。”

说完又领我们穿过马路，到另一个地方。这儿没有牌子，不知是什么地方，由于刘科长在这儿，估计这是公安厅的所在。我的东西由刘科长帮助拿，走了半里地，进了一座新的小房子——呵，看守所！门前有战士站岗。我们都走了进去，刘科长对我说：“段克文还嘀咕不嘀咕了？你们不要有顾虑，这里还有两个人。”回头他告诉这里的干部找来那两个人，不一会儿李寓春、尚传道来了，这回我们七个人了。

我们被领到了监号，共住两间屋子。尚传道、段克文、李树桂和我在一间；另一间是李寓春、黄炳寰和刘荣第。政府发给我们许多新东西，洗脸盆、毛巾、肥皂、茶杯等。新房子有木床、有桌椅、暖水瓶……骤然到了这么一个窗明几净的屋子，真是心旷神怡，精神痛快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。当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心情还不能冷静下来。尚传道对我说：“我以为把你释放了，不成想在这又见面上了，想不到。”

这些人在长春差不多都认识，见面以后都要谈一些自己的经历，总的两句话，解放后都在反省，在政府的宽大之下都没有被处死。

中饭，每人一大碗大米饭，一小碗炒菜，内中还有肉，吃起来香甜可口。心想，吃这么好的东西，住这么好的屋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五个人相互谈论这个问题，正面的看法是重复刘科长的话“加

速改造，也要有生活照顾”，但究竟为什么要加速改造？不明白。

段克文说：“可能过去判偏差了，这回对咱们纠偏。”

我首先反对：“你判了，我判了，尚传道和李寓春还没有判呢，纠什么偏？又有什么偏？对我判的不偏！”我一反驳他，别人也不吱声了。

到了这个环境，比在长春监狱好得不能相比，首先是精神没有压力，不要顾虑一找谈话就出是非，或是戴脚镣；在物质上更不用说，吃得好、睡得好，夜里三次暖气，一点也不冷。

市局叫我写特务训练班情况的那个科长，又来找我谈话，还是写材料的事。他一见面就说：“这个环境比你所希望的怎么样？”

“好得多了，这不是‘小米’了，是‘大米’！比我希望的超过了許多。”

在长春监狱典狱长办公室审讯我的那个女干部，也来到这儿提我了解材料。陪同她的那个男干部问：“关梦龄，你多大岁数了？”

“今年 41 岁了。”

“不像 41 岁的人，很年轻嘛！”他说完看看那位女干部。

“好好改造，还可以给人民做不少的事情。”女干部鼓励我。

又问我们学习什么呢？我说学习《第一个五年计划》。

那位男干部说：“都要学习，连溥仪还要学习呢，都要改造，不学习就落后了。”

材料了解完他们走了。我问李所长，这个女干部是不是公安厅的处长？李所长说：“是市局的处长。”

一提市局的干部就有好的印象。我从个别人的印象出发看事物当然是不全面的。

一些公安机关及各单位保卫干部，都到这里来提审我，了解材料。一见面，从服装、言谈、作风，我就能估计这个干部是什么职务。比如有一天来了一个大连公安局的股长，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会计长侯景文的材料。这个股长穿着一套蓝呢子制服，白衬衣已经有点脏了，穿着夹皮鞋。看来他不是长春的干部，这么冷的天，穿夹

皮鞋，少见；这么新的呢子制服，内中白衬衣却有灰了，一定是走了远路，没来得及更换，不然，这个呢制服与这个脏了的衬衣不相配呀，从哪来的呢？他坐下先问我：“听说你改造得不错。”

听这话他不是市局的人。

他说：“了解侯景文的一些问题。”上次，有一个审讯员问我侯景文在大连的关系，这个干部很可能是从大连来的。我看这个人很开朗，很随便，我就问了：“您是从外地到这儿来的吧？”

“我从大连来的。”

“你穿这样的皮鞋，不冻脚吗？”

“我以为长春不能这么冷，来的时候太仓促。”

我心想，好像跳完舞就上了火车似的，也是个好玩的人。我说上次有一个干部来了解了一次侯景文的材料。他说：“对，来过一次，有些问题，还没搞清楚，这回我自己来了解一下。”

可能是个科长或股长——“我自己”，表示下级不能办事，要亲自出马。我这样判断，大致是不会错的。最后，他说自己负责审讯股工作。这是个喜欢说话的人。还有不说话的人，只凭眼睛我也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

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，一进屋穿的皮棉鞋，戴着皮手套、围巾、口罩和皮大衣，崭新的小棉袄套着单制服，可见这是临时做的。没有到过长春的人，以为长春能冻死人，穿戴这么多仿佛一个空军驾驶员。他的手提帆布包印有“北京×工厂”，我初步认定他是北京来的干部，果然一谈话，他是了解北京外围特务的情况。

有一些二十三四岁的干部，在审讯中板着面孔，他的心理是：关梦龄是个狡猾的特务，不能叫他钻了空子，所以对他要严肃。问一句，第一句，他掌握的材料也不多。他的上级临来的时候，只叫他了解一件事，别的事他不问，你说多了，他也不爱听，听也听不懂。这样工作效率就很低，同时，这些年轻干部有一个戒心，与这些特务说一些用不着的话不应该。

有一次，那是 1955 年 10 月 28 日，长春下大雨的一天，四个干

部到长春监狱，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财政厅长姜守全的材料。这四个干部有三个穿着夹呢大衣，一个穿着风雨衣，两个挟着黄皮公事包，年龄都在35岁以上。坐下之后，一个问，其他三个人在旁边听，在我答话的时候，那个高个儿的，有40岁的人，两眼一会儿看着我，一会儿又看看房顶，他虽然不说话，但这些举动能引起他们三个人的注意，我说了一段话，这三个人都要看看他的表情。我心中明白了，问话的人不是负责的，这个高个儿是决定问题的，果然，他说话了：“姜守全与军统的关系，是组织关系还是像你方才所说的朋友关系？我们要了解他在吉林的社会关系。他在离开吉林之前，有没有布置潜伏组织？在北京他都些什么社会关系？”

像这样了解材料，都是全面的掌握了姜守全材料之后，才往外发展他的亲友，他的部下，他的同事等等，这几个人不是一些下级干部，他们是中央级研究特务组织的干部，并且不单纯限于了解，而是研究特务的一切。因为姜守全已逃到台湾，写这样的材料是准备在一定时候应用，并且肃清他在大陆上的反动的社会关系。这些人一了解材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随便不负责任的回答式的谈话，他们不能满意。那个高个儿，说话费斟酌，问话很稳重，没有想好，没有造好句的话不出口，这样的干部是负责任的老干部。

黄炳寰腿疼，这里的李所长问他治没治？他说喝虎骨酒有效。李所长便上街买虎骨酒两大瓶。这里要什么有什么，真想不到，这种优厚的待遇受之不安。

李所长这个人有二十七八岁，说话声音很低，和蔼可亲。他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仿佛像托儿所的阿姨一样。先叫我们把背上“犯人”两个大字洗掉，洗不下去用汽油擦，因为是铅油写的，汽油也擦不掉，便重发棉衣。我的衣服又小又不好看，便发给一套黑斜纹干部服，别人的衣服也都换了，没有帽子的买了新帽子。

晚上，韩科长找我说话，鼓励我们早日改造好，在改造中给予一些物质上的照顾，是为了帮助改造，并且说：“将来还有可能到社会上看一看建设的情形。”

我们认为把北满的少将以上的反动派都集合到这儿，这是中央统一的命令，对我们要很快处理。我个人的想法也不外乎是集中优待，快速处理。

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

真的要我们到社会上去看看！快八年了，我不知道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？也不知道社会都有什么样的变化？这回可以一饱眼福了。

参观新建的长春汽车制造厂。

旧历腊月二十八了，工人宿舍的主妇都在准备过春节的食品。我们参观了几栋工人住宅，楼上楼下没有煤灰，一律用煤气。每套房间有淋浴室、住室、小客厅、小厨房。井井有条，清洁非常。回想一下，过去东北的一般大地主也没住过这样好的房子。住这么好的屋子哪能不好好劳动？哪能不想办法发明创造？哪能不感激共产党、毛主席呢？解说员说：“这是比较好的住宅，并不是其他工厂都这样，我们有同志还没有搬进这样的住宅，仍住旧房子，离这儿也很远。”

到了装配车间，这是制造汽车的最后一道工序，将来正式生产，9分钟一辆汽车！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制造过汽车，中国过去所用的汽车是“万国”牌，就是哪个国家的都有，就是没有中国自己出产的。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，有了第一个汽车制造厂，这是新鲜事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国民党贪污腐化，什么建设也不能搞，就能搜刮人民，压榨人民。

在底盘车间，解说员说：“这个车间的地板是最好的松木块，经过消毒、上漆，七道工序制成，一块一块的立着放，能隔湿、隔凉、震动小，可以使工人不患关节风湿病。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多数是

水泥地，工人常年站在石灰地上干活，到晚年两腿不能动，半残废。”这么一听，在我们国家劳动的工人真是幸福，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。

春节吃得很好，在监狱是想象不到的。这位炊事员手艺好，人规矩利爽，一看就知道他过去在大饭馆干过或住过大公馆。就是中午炒一小碟咸菜，也好看好吃，达到了做菜的“色味香”要求。过春节，饺子、花卷、鱼、过油肉、葱爆羊肉，做得都很好，这样的炊事员怎么能到看守所给犯人做饭？一定是从哪个单位临时调来的。

崔所长怕我们过春节寂寞，给我们预备了象棋、军棋、扑克，他进来和我们一起玩。如此怕我们想家、闹情绪，真是关心备至。因此不仅在饮食上，且在精神上，这个春节过得也最愉快。

崔所长是吉林公安厅的老干部，1948年10月我在吉林自首，他知道，他说：“那时你若不努力争取，是很危险的。”

过了春节，我对尚传道说：“我们干什么事来报答政府这样的宽大照顾呢？”

他说：“写一些关于台湾当局的材料。”我说可以，我建议：“给台湾的熟人写信，叫他们起义，回到祖国的怀抱。”我写给项迺光一封，岳梓宇一封，都是大特务，与我私人关系比较好。这样的信可以广播喊话，或电台播送。

2月18日，坐上租来的公共汽车去市里参观。先到吉林食品厂，后到公私合营的益发合，最后到长春百货公司第二商店，整整一天。到长百第二商店参观，使我想起解放前，在这个楼下逮捕过地工人员，查封过一个青年药房。那时这个地方住着士兵，糟蹋得残破不堪。现在旧地重游，不能不想起过去的罪恶。这不是参观，是检讨自己的罪恶。

长百第二商店，有八千多种货物，令人自豪的不是货物品种的繁多，而是货物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生产加工制造的。不像解放前的百货商店，化妆品是法国的，毛织品是英国的，丝织品是日本的，到了解放前夕，一些百货商店都成了美国商店了。现在，到长百第二

商店一看,有许多货物比美国的还好,一些绣花缎子是出口的商品,自行车样子美观坚固耐用……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人民翻身当家,发挥出无限的智慧才能,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。

2月20日,起床很早,告诉我们到市外去参观。韩科长和五六个外勤人员与我们坐一辆汽车。过完春节,还有寒意,走了一半路,韩科长叫汽车停下,下车活动一下,又继续行驶。汽车开得很快,一百五十里的路程,两个多小时就到了。

我们参观的是长岭机械化农场。农场主任介绍说:“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地,没有人烟。现在有了五百多亩大田,国家发给了大型拖拉机,建造了厂房,增加了一些技术人员,成立了三个生产队,成为吉林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。去年收成很好,给国家收了30多万斤粮食。今后还要扩大,一切劳动全部实行机械化。”

接着参观拖拉机,苏联的履带拖拉机“热特”、联合收割机,驾驶员在院子里驾驶“斯大林80号”拖拉机,“热特”机正在切豆饼。天很冷,冻得人手不敢碰钢铁,有许多机器没有开动。

下午又坐车走了十里地,到这个农场的第二大队参观。这里一片平原看不到头,主任在汽车上说:“这个地方的土质很肥沃,方圆百里,都要开垦成良田。我们这个农场还需要大批的人力,将来你们再来的时候,就不认识这个地方了。”

农场主任高大身材,黑红的脸,有三十几岁,学机械的,人很稳重,说话言谈显示出一种果断的劲头,充满着乐观精神。在这么一块荒地建成一个这样大的农场,不是有共产党的领导,不是有能吃苦耐劳的共产党员带头苦干,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。我想将来中国的土地都能用上农业机械,那就好了。

路上,有许多野鸭在开阔地上站着,非常好看,外勤人员开了一枪,没击中,全都飞了。

第二天早饭后,我们到长春市郊的“红星蔬菜合作社”参观。汽车先开到市委会,找来一个女干部带队,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圆圆的脸,大大的眼睛,穿一件新蓝细布棉大衣,像个胖娃娃,挺惹人

喜欢。她上车指着方向，引导汽车前进。

这个社的男女社员穿得整整齐齐，每个人的脸都胖胖的，说说笑笑，显出来生活的富裕和愉快。这个社的负责人是个老头，有50岁的样子。他见到给我们带队的女干部，小声问了一些情况。这个小女孩胸有成竹地告诉了这个老头许多话，她一边说，这个老头一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然后她对韩科长说：“叫社主任报告一下这个社的情况吧。”

于是就由方才那个老头，向我们报告了该社成立前后情况。解放以前，这个庄子只有一家地主，几十户贫农。贫农吃不上饭，家中没有被子。解放后，贫农分了土地，成立了互助组，合作社，生产多了，生活富裕了。现在家家都有新衣服，都有余粮。蔬菜供应市内，冬天有暖室，照样生产新鲜蔬菜。

社主任带我们参观暖室，参观养鱼池。许多男女正在挖很深一个大坑，这里预备养十万尾鱼苗。在养鱼池边，站着一个女的，有20岁，手提黄帆布包，与我们一块来的女干部说起话来。看来她们都是干部。解放前这些小丫头，在有钱的家庭是小姐，娇生惯养，什么也不懂；在穷人家便要拣煤核，吃不上饭。可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，这些小丫头都能办事了，这也是了不起的变化。社主任不是服从小丫头，是听党的话。

参观中，我看到一张长春人民法院的布告，上面枪毙了两个土匪。看来土匪和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，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。

参观回来，车过大经路，看到一家门口挂着大红横标语“长春市公安展览会”。我一想，公安展览会开过多次了，现在还展览什么？1949年的公安展览会，把督察处杀人的佐证都展览出来了：有被杀人的相片，有我坦白的材料，我的军服、便服，以及其他有关的照片，甚至我小老婆从北京来的信也展览出来了。这些情况都是以后被捕的人到了看守所对我讲的。我认为现在再抓到正式军统特务是很少的了。

参观告一段落，写参观感想，我写了七页。第一，感激共产党对

我们的关怀,用参观的方式,帮助我们改造;第二,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,现在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,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,相信一定能建设好;第三,感到自己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,还给人民增加许多负担,于心不安……

过了两天,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漫谈参观感想。我在发言中说:“国民党时期,为什么不能建设汽车制造厂?共产党找苏联帮助,国民党找美国帮助行不行呢?我考虑了几天,办不到。有许多理由,第一,国民党贪污之风不能肃清;第二,不用人才,只用奴才,用的三亲六故,不是小舅子,就是大妹夫,再不就是‘五同’,即同乡、同学、同事、同志、同参(在青帮家礼,同一辈就是同参);第三,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立,要随之成立许多工厂,比如长春小五金厂、电木厂、哈尔滨电表仪器厂、哈尔滨轴承厂、玻璃厂等,都是围绕汽车生产部件,不是单一汽车厂的问题,是整个工业化的问题,这是国民党没有法子建设起来的;第四,国民党办的兵工厂,设立军统局的‘警卫稽查组’,专门监视工人的言行,工人在那种情况下,能好好干活吗?更谈不到发明创造了;第五,如果国民党办的汽车厂,建那么些住宅,是不会给工人住的,要科长、处长去住,工人住草棚子;第六,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,私有制度不能为工人着想,不能为国家着想,只能为自己着想,只要自己发了财,有钱可以到外国买汽车。私有制度办的工厂,别的工厂不是援助而是拆台,或拿把,是没有计划的生产,不是全国一盘棋;第七,别的什么也不建设,单单建设起一个汽车厂什么用也没有。国外不要,出不了口,国内不要,老百姓买不起。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,工农业同时建设,齐头并进才需要汽车。这是全面的问题。”

每天上午学习,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,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。晚上文娱活动,打扑克,下棋,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。

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，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，有时也忘了。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，我的喽罗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，叫我写上上下款，还在下款写上“关梦龄赠”。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。这样作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。戴笠活着的时候，一向是不照相的，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，没有同学录，没有合影留念。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相片。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，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，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，不准洗出来，这是他的习惯。可是1945年“九·三”胜利之后，他穿上中将服，便照起相来。1945年12月16日，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，出乎意外，照完相不久，1946年3月17日，他就坐飞机摔死了。死后，就用这张中将制服的相片开了追悼会，否则，追悼会便不能摆照片，只能写灵牌了。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，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，如能缉获悬赏20万元，送信者可获5万元，可是没有相片，因为也说不出戴笠有什么特征，戴笠防范暗杀或发生意外，他自己杀人多了，也怕别人暗算他。

我在长春照相也是不合规定的。突围前我虽然把家中的许多相片都焚毁了，但是在各处的相片，各照相馆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里。这张合影是从照相馆里找来的，我这样判断不会错。

4月，周总理在政协做报告，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，回到大陆。我们几个人看到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起义的报道，心中十分愉快，认为台湾解放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

我想台湾解放之后，军统局那些大小特务都要回到大陆，我见着他们可以帮助他们，做一个带路人。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，比如那些叛徒，张国焘、谢利功、廖化平，他们怎么办呢？是流落国外？是回到大陆？还是投海自杀？我想这回解放台湾是不成问题的，如果台湾方面没有派人与人民政府接头，不会骤然发出这么一个号召，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。我想这回我不是15年的问题了，是出去干什么的问题了。想着想着，想入非非。如果不是叫我开饭，我都

忘了身在看守所。

没有事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就谈解放台湾的问题，都做了一些错误的估计。比如说台湾解放后，我们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给我们安排工作，甚至工作地位还不会低，明知这样估计不实际，但也没人反驳，何必叫大家扫兴呢。

每天我看不少书，写不少笔记，不间断写日记，认为马上就要出去，肚子里没有东西怎么办？毛主席关于农业发展的文件，一读再读，择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诵下来。

过了“五·一”，韩科长叫我们在这个小院种花，美化环境。我对崔所长说：“少种花多种菜，花又不能吃。”

崔所长买了不少菜籽，也买了一些花籽，这个小院子有一亩多地。别的犯人都关在号里不能出来，只有我们9个人每天专心在院中活动。我们先翻地，只有李树桂说他在解放团干过，其余的人谁也不会干，我用铁锹还外行。9个人虽然累得腰酸腿疼，地翻得依然很浅。崔所长一看笑了。地翻完种上小白菜、芹菜、黄瓜、辣椒……院子空地种了百分之八十。韩科长一看，责怪起来：“唉呀，你们经济观点太严重了，多种点花院子好看，调节空气，夏天有菜吃。再挑空地方种花吧，别再种菜了。”

5月23日下午，韩科长召集我们9个人到大客厅，告诉我们明天要去沈阳，依旧嘱咐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，并特别指出：“在火车上要随便一些，不要拘束，带着扑克，在车上玩一玩。”我理解韩科长的意思，在火车上别叫人看出来是犯人，可以说笑，大大方方。如果在火车上一坐，9个人一动也不动，像木头人似的，别的乘客会以为这些人是聋哑院来的。韩科长想得很周到。

回到屋子，李树桂说：“如果到沈阳，可能每月还给零用钱，在解放团时，每月发5元钱，我看到沈阳如果入解放团也能发零用钱。”

我说：“每月这样的伙食，有3元钱零用，够买烟就行了。”

大家议论纷纷，猜测判断，我结论说：“反正越来越好，绝不会

越来越坏。”

这个结论，大家都同意。

收拾东西，心里不安静。这儿的环境很好，小白菜已露头了，书报杂志什么都有，这几位干部对我们也好，离开怪舍不得的。还有比这好的地方？我不敢想了。

韩科长叫我们都给家写封信，告诉离开了这里，将来到了沈阳再写信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给我的女儿关棣写了一封信，告诉她我明天去沈阳。这样的信她接到也不会高兴，什么时候出去也不说，写信总是说“我很好”，“政府很宽大”，“不要惦念”，成了例行公事。把我的信拿出来一对照，除了日期不同，大致是一样的。我不愿写这种不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信，这回写了是应酬政府，不然叫政府看我这样消极，与我所说乐观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吗？

上灯的时候，先把张大光提出去，接着又把李树桂也提出去，我以为又是韩科长作个别谈话。我与尚传道整理书籍、包袱。过了半点多钟，他们回来了。他们说：“政府派汽车把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接来，在办公室接见，随便谈了半点多钟！”

真想不到，张大光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来了，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，大人孩子说说笑笑，李所长给倒茶，叫他们多谈一会儿，像到亲戚家一样，真叫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。虽然我的家不在长春，可我同样感到共产党的温暖。我后悔我的家为什么没有在长春呢？

如果过去我们对人有点好处，一是把自己摆在前面，叫人家领我们的情，张张扬扬，那个样子真讨厌，而韩科长、李所长不多说，做出来的事，叫人一看心服口服。自然这一切是上级党指导他们办的。他们能完成党的指示。这可谓指导得好，办事办得也好。一般情况来说，起解前是不应当泄漏机密的，可是出乎人的意料，明天解往沈阳，今天就把家属接来了。并且畅所欲言，大人孩子都是笑着分手的。

上床之后，我思想很紊乱，想起在长春的一切，又憧憬着到沈阳的情形……

5月24日,吃过早饭,一辆敞篷汽车拉着我们开往火车站。一位警察干部是这次列车的警卫负责人,他与我们一齐上了火车。

别了长春!在这住了八年半,这回分手了。我是1947年11月24日从沈阳乘飞机来的,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车走的。一来一往,个人和国家,甚至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8年半也不算一个短时间,人生一辈子能有几个8年半呢?这8年半的时间,比我过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,这8年半,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,受到人民的宽大也较多。一方面痛恨自己,另一方面也感激共产党对我的不杀之恩。

在火车上,我打消这些想法,与大家说笑打扑克,政府买了不少糖果罐头。我们9个人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谈着玩着。韩科长也参加进来,介绍沿途上的一些建筑物。这样随随便便,除了车上那个警察干部知道我们是犯人,别的乘客谁会知道我们是犯人呢?

下午3点,到了沈阳南站,下火车上汽车,辽宁公安厅的干部等候在火车站。行李另有人负责运输,这样轻松的出门,在过去也是很少的。汽车往北行驶,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条街道,进了一个院子,有大门,小门——明白了,还是看守所!

沈阳寄押

我们一一进屋,大高个李寓春、于泽霖、黄炳寰先进屋,我在最后面。我想干什么都要讲运气,按个高矮进屋,运气好进的那个屋子的犯人脾气好,没有个性,生活在一起就无问题;如果都是好吵,好闹的,“我说了算”的那一套,就够伤脑筋的,说不定与他吵起来犯错误。一切事情都有机会存在,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。

我被叫到第3号监房,没有床都打地铺,小窗户像仓库的窗户,咳,这与吉林公安厅看守所差远了。屋内有4个人,右边第二个

铺位没有人住，露出了草垫子，不用说这是给我留的。我把鞋脱了坐在上面，这 4 个人事后知道是张国泰、姜明文、郑明新和李衍涛。我一坐下，他们都看我。从他们的惊异眼光里我意识到，怎么来了一个小孩？窃盗犯？不能，这些人都是少将以上的反动派，他的岁数也不对呀？他是干什么的？

我坐了一会儿，他们问我从哪来的？我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又问都有谁来？我也告诉了他们。接着他们问我年龄，我说：“41 岁。”他们说“没有”，“只不过 30 岁左右”，我笑了。

晚饭吃的高粱米，菜里有点肉，倒也挺好吃。饭后，我们又到看守所去登记。在那儿看到了韩科长，我们对韩科长说，这里不如长春。黄炳寰说：“这里邮信要自己买邮票。”一句话，这里比不上长春。韩科长说：“习惯就好了。”

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里运动，看到了陈旭东^①。有许多人以为陈旭东与我一定认识，并且还有工作关系，可是我们俩仅见过一面，那是 1945 年“九·三”胜利之后，我在北京当“北平肃奸委员会”总务科科长。12 月底有一天到机场去送人，遇到了陈旭东和他老婆，他们要飞锦州，有个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，打了个招呼就分手了。以后再也没见面，工作上也没来往。到这以后，别人问我，我说见过，问他，他说忘了。今天早上一见，哈哈大笑，不成想在这会合了。我们这 9 个人与这里的人相识的不少，尤其东北籍的，讲武堂的多，旧同事也不少。

这里是辽宁公安厅看守所，我们这批反动派原来有 30 多人，前次走了一批，如李仙洲、卢浚泉等，据说到了北京。这里剩下 21 个人，加上我们共 30 人。这 30 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，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。

犯人见面，例行话题：“判没判？”“从哪来的？”“那儿都有谁？”“这里吃得怎样？”“可不可以通信、买东西、接见？”“哪个班长厉害？”没用两天一切都弄明白了。最后一致结论，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，时间是 1956 年 1 月。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

好的。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，只有我是上校。因为是军统特务，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。

关于处理的问题，大家都认为很快就会叫我们自由了。因为周总理最近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“爱国一家”的精神，实现祖国统一。这与我们都有关系。黄炳寰要给家写信，陈旭东说：“写什么信，不等你的信到家，你就到家了。这里的情况我熟悉，我在1953年从南京到这儿，我是这里的老犯人了。”

我一想，集中之前他便在这儿，集中之后他又没走，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，他这样说也可能不是单纯的希望，一定有所根据，于是我也高兴起来，与陈旭东谈起来了，问了一些旧同事的下落，他告诉我：“袁晓轩也在这押过，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，以后不知到哪去了，可能病死了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从南京跑到台湾去？”

他说：“不想走。”又说，“那一天，李宗仁的飞机在机场。我一寻思，不走不走吧，我没到机场，就留下了。”

问他“毛人凤给你任务了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既不走，又无任务，这不单等着送死吗？我也不好意思像审讯案子那样问他，算了，将来就会明白了。

因为都是从一个泥坑里来的人，职位又都差不多，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弯抹角的都认识。谈旧人旧事，形成了高潮。过去在长春监狱什么也不敢谈，到这里无禁忌畅所欲言。有一些人，如卢广续在沈阳当了工商联副主任，任逖生在沈阳市当了政协委员，张政枋在沈阳当了省政协委员。人家都走对了路，自己还在押，心中颇不是味，自惭形秽。

我想，到这就能释放吗？于什么去呢？想了许多也没个头绪，最后这样结论：不用想，反正共产党给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一切都有了。现在要办点货，充实一下，不然到社会上连话都不会说，那不是贻笑大方。

隔壁住了一个黄鹤^②，年龄不大，说是傅作义那儿的少将。我

在傅作义那儿做了几年工作，上校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的，没听说有个黄鹤。也许 1948 年以后去的？有一个早上我问黄鹤：“老黄！傅作义那儿你呆过？”

“呵，呵……”

“我有几个朋友你认识不？二处处长史弘、三处处长任兆同、副官处长黄记五，他们在北京没有？”

“我在外边，老不在家，不熟悉。”

我心想，在傅作义那儿不认识这三个人，就不能工作。胡说八道，冒充！再说，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没有这样年轻的？解放前我嫌官小，被改造后嫌官大，可是黄鹤竟然在这里充少将，有意思。这内中有文章，有奥妙。

政府拿来登记表叫我们填。上面有社会关系，分在大陆的和台湾的。我们一看，这是解放前填的一张表，台湾的关系尤其重要。政府人员说，在台湾的关系，要写与你有重要关系的，能够听你的话或无话不谈的朋友。我一听，这是说叫他起义他能听，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虑一下你的意见。填这样的关系，我们不约而同都联想到台湾解放的问题上。填完了这张表，焦躁出监的思想发展到看不下书报，有一些人，如陈旭东、万厉、黄鹤，见人就说：“快了，没有几天了。”这些话不讨厌，不能实现也没关系，他们的心是好的，属于“吉利话”的范畴之内。

又继续写材料，这里与吉林公安厅不同，了解材料的干部进不来，只能把提纲交一个干部送进来，要我写。每天都有，还不少。

到了 7 月，有一天事务长来到监房的仓库，叫我们把棉衣抱到院子晒一晒。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探问了一下，我把衣服抱出去，对事务长说：“哎哟，这衣服冬天还能穿吗？”

“怎么不能穿？”

“领子都破了，露了棉花。”

“补一补，可以穿。”

这些棉袄冬天还要穿！这证明走不了了。接着又给我发了一

床崭新的红花棉被。

照理说，政府发东西我应当高兴，可是这回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些征兆说明，我们最近走不了，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：不要妄想了，共产党不会轻易把我们这些人释放出去，安心吧，必须有个两年计划。再不要听陈旭东这些人瞎说了，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呢。

每天上午学习，看书报，每礼拜三合并讨论，大家发言。这天看到一组新闻图片，中国政府审讯日本战犯及溥仪在审讯时作证的图片，登在《人民画报》上。接着报纸刊载了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消息。我们一看，议论起来了：“日本战犯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，现在都成千的往回放，我们还是中国人呢，也该放了。”

我认为说得对，日本战犯是侵略中国的，而我们呢，与共产党并肩作战打过日本人。周总理在政协报告中，谈到台湾解放时也说过这个问题。后来，我们虽然反对共产党，杀了不少革命人士，可是比起日本战犯终究要好一些，现在他们都释放了，我们不是也应该释放吗？不是最近释放，但不会很久。

报纸上刊载了一些国民党的中、少将在各省政协上的发言：这些中、少将有的是起义将领，有的是进步人士。这些消息与解放台湾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于是有人认为，我们出去也能当个政协委员。

在这儿仿佛是寄押，从来也没人找我谈话，学习与开会很少有人指导。领导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普通干部，每天他虽然来此，但对具体问题从不作指示。比如我们漫谈埃及问题，有两种意见，有人认为事态可能扩大；另有人认为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英帝不敢动手。类似这样问题都是不了了之。因此学习收获不大。从这些我判断这里不是长久的改造场所。

有一天，我们到院中去拔草，听到事务长打电话，是请求对方给房子。他说：“不行，不能将就呀！人太多住不下，请你们给想一想办法吧，要有学习的地方，只能住人还不行……”

找房子，还要搬家！这可麻烦了，既然要找房子，就不是个短期

间的改造。

董必武院长在政协上报告说，对反革命分子，除了民愤极大的处以死刑，一般不处死刑。我一想，今后枪毙人的事就少了，大概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，无须再像 1951 年那样，大规模的成百成百的枪毙。将来剔除死刑更有可能了。人民的觉悟高，人民民主专政巩固，坏人藏不住，反革命分子活动不了，处刑尺度也要宽了。

从台湾到大陆的现行特务张毅，是上校专员，中统的。到了杭州他向人民政府自首了。政府对他无罪开释，并且给他安置在图书馆工作。我想，如果我在 1948 年 10 月不在吉林自首，也像张国卿、项迺光那样跑到台湾。到了台湾，受了使命再回到大陆，一自首，不也能像张毅一样？想到这里，认为张毅赶上好机会了。自己又一想，如果 1948 年逃跑，在途中被捕也就完了，那与陈牧一样，在四平抓着解回长春镇压了。过去的事不能后悔，悔之无益。进一步说，1948 年我起义，把督察处政治犯都放出去，我率领亲信部下投到人民政府，那不比现在的张毅还强？这么想都是吃后悔药，不想想，1948 年我能起义吗？有什么思想能支配我起义呢？不可能的事，想它干什么？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我比张毅不如，但我比陈牧等人还不是好到天上地下吗？不能比，也不应该比，一比就是不满现状。

8 月初，天气热得不得了，白天准许把门打开见见风。这里的规定，每天监房门都要扣上，夜里上锁，白天小便，班长把门打开，回来再扣上。夜里小便也要报告班长，班长把锁头打开，这个屋子门响，那个屋的门也响，都去小便谁也睡不好。有一次，我对张所长说：“屋里放一个尿桶，比较省事。”他说：“太不卫生，空气也不好。”

天气热了，把门打开了，仍然是满身大汗，在屋光膀子，只穿一条小短裤，好在这里没有女干部，我们都很随便。天气一热，心又不定，很焦躁。

9 月 14 日这天，12 点已经过了还没有开饭。每天 11 点 50 分，厨房就送饭来，今天 12 点半还没来送饭，我说：“好饭不怕晚，今天要改善，大家不要着急，好好等着吧。”我这是瞎说，但歪打正着，果

然改善伙食，到一点钟才开饭，炖小鸡，大米饭，鸡肉多得很。我心想，今天是 9 月 14 日，既不是星期日，又不是假日，为什么改善呢？吃完了饭，看守所叫我们到前面大审讯室。这个屋子我还是第一次到，屋子摆了 30 个椅子，前面有一个条桌，这时来了一个高个黑脸的干部，李科长介绍他是张处长。张处长告诉我们，要把我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，明天就走。说那个地方比这儿好，到那儿要好好学习。接着叫大家谈谈感想。张禹斌等人发了言，认为把我们这些人送走不管了，希望张处长常到那个地方去对我们教育。这些不是思想话，仿佛旧社会的词令，听着不顺耳。接着又有个人发言，表示有一些顾虑。

张处长最后讲了一些话，没用发言稿，他说：“改造不在说得好，要看做的如何，要言行一致。共产党不仅听你们说的，还要看你们实践，你们有的人无事找事，给老婆写信要离婚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家人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？这种做法是不对的。”我一听就知道是批评尚传道。尚传道到了辽宁公安厅之后，就认为自己快释放了，老婆在 1950 年要与他离婚，他没理。可是这次他认为自己出去讨个老婆不成问题，个性一发，给老婆写信离婚。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，真是无事生非。

张处长又讲了一些话，犯人接着发言，我都没有仔细听。我想心事，5 月 24 日由长春到这住了不到 4 个月，又要往别处挪，真麻烦。从北满到南满，从南满又到哪去？估计不到了，到旅大？不能，那是海军基地；到辽阳？那个地方离千山不远了，如果在千山改造，那个地方风景很好，有龙泉寺、五佛顶、青云观……我幼年时去过……想了一会儿，没有理出头绪。

郑明新是 52 军副军长兼营口警备司令，住过解放团，他说：“解放团还可以上街吃馆子，极随便，那里不叫犯人。能到解放团，真是解放了。”

我想，凭命由天，到哪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，干特务这行的谁也不相信。

9月15日早饭后，张处长、李科长，还有一些班长都来了，班长们帮我们往汽车上装东西。共两辆汽车，一辆卡车装行李和看押班长，另一辆有篷的汽车坐人。有篷汽车在前，卡车在后，张处长坐卡车。

汽车出东关，往东陵开，大家知道了：去抚顺！90里，不远。

抚顺距我原籍新宾二百里，我小的时候从新宾到沈阳，在抚顺要住一夜，那时叫千金寨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仅能想出街上有大车店，几家小饭馆子，别的印象没有了。

汽车到了旧城，转了几条街停下了。这不是解放团，万厉在抚顺住过，他一看大门，说道：“怎么又到了监狱？”

①陈旭东：据第七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：“陈旭东 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”，沈醉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记：“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并交给军统囚禁，戴笠将张的旧部陈旭东、吴骞、王化一等也接收过来，安置在军统工作。”

尚传道等人称陈为“张学良的戴笠”。

②黄鹤：据舒靖南《春风化雨沐党恩》记：“到了管理所以后，竟有人以小报大。例如黄鹤，沈阳附近人，曾在伪满军警界混事，填履历伪造国民党军181师参谋长，不料该师师长米文和也在所内，所方特让他俩见面，却互不相识。”舒与关梦龄的判断吻合。